

孔夫子的書寫： 《春秋》中的「闕文」與「不書」

李紀祥

摘 要

本文將「闕文」與「不書」視作是《春秋》中「空白敘述」的兩種表述形態。前者係一種「待書寫」，後者則是指向「空白」的「已書寫」，而非「未書寫」。「待書寫」、「已書寫」、「未書寫」，作者實已對《春秋》本文進行出對於「空白」三態之區分。

「闕文」語出《論語》，被孔子用來指稱史官、書寫與傳統的關係；「不書」則係出於三傳，用以解釋《春秋》中的「賦義」何以與無形之文的「空白敘述」有關。因此，《春秋》中的「空白」狀態是可以被解釋的，三傳後學能在「不書」與「闕文」之間進行「空白」態為「待書寫」或是「已書寫」的意義認知轉換，就是最好的例子。

作者認為，本文自書寫學上對《春秋》本文中「空白」態的研究是重要的，不僅是對「空白」三態的區分，尤其是對「闕文」與「不書」的區分，它暗示了早期有一種書寫行動，在這行動中，有一種「空白」意識之察覺，但卻沒有訴諸於「文字」之有形。它更是一種特殊的「書寫」的立場：一旦我們在《春秋》「上下文」間揭示出一種「空白敘述」時，「空白」也就與有形符號一樣，也是一種書寫符號，必須加以閱讀及解讀。

關鍵詞：《春秋》、三《傳》、書寫、空白敘述、闕文、不書

孔夫子的書寫： 《春秋》中的「闕文」與「不書」

李紀祥

一、前言

(一) 《春秋》與“annals”

波蘭學者Topolski曾從內容上的時間性，將歷史敘事（historical narratives）區分為三種理想型（ideal-type）：年鑑（annals）、編年史（chronicles）、及一種更為嚴謹的歷史敘事——編史學（historiography），Topolski其實仍認為annals是較初始的，它在結構上由單一事件（isolated event or single record）構成；相較於此，chronicles便具有條與條之間的因果相續性質，關鍵在於年與年之間的相互為序，使chronicles更具敘事性。雖然Topolski也強調這僅是一種Max Weber義下的理想型區分，實際上這三種型皆是互存的，但是，明顯的，他確實將annals視為僅是記錄的單純屬性，在型態上較為原始。¹

顯然地，如果我們用他的觀點來嘗試觀看《春秋》這一部現存的文本，並且將《公》、《穀》、《左》的經傳析離，將經文的部份稱之為孔子的《春秋經》，那麼，在表象上，《春秋》確實「長得」像極了這位學者所謂的年鑑(annals)。但是，這個中國的古老文本，在面對西方近代歷史學的理论分析時，卻讓我們警惕到，在這個「長得像」的表相之後，支持「長相」的歷史性卻極為複雜。首先，對《春秋》稱呼的文本屬性我們必須有所了解，這一詞固然可以作為一個單純指涉，用來稱呼那個「孔子的」書寫文本；但在許多場合，它指涉的是一個經與傳的合成文本。正是因為有「傳」，才有被「傳」據以依托其

¹ Jerzy Topolski, “Historical Narratives: Toward a Coherent Structure”, *History and Theory* 35 (1996), pp.75-86.

存在的來源---「經」的稱呼之出現；或者相反，是在發生的順序上，先有孔子的《春秋》，才有《傳》的出現；有了「傳」的稱名，《春秋》才能相對於「傳」而稱之為「經」。其次，在當今的現實上，傳與經的現存性是合成文本；但是，顯然在中國古代傳統上，傳與經不必然要在刊印或抄寫上合為一冊，至少在漢代，經與傳確然是分別存在的單行本。這已意謂著：不論是單行本還是現存的合成本，經與傳的稱呼都使得《春秋》不再只是如其長相般，只被單純地視為是單條紀事的編輯本。這也說明在經、傳、注、疏的互文系統與脈絡中，今日所見的宋代「單疏本」，即使沒有「注」印入其文本中，但它還是具有「疏以釋注」的互文本質，互文性使得單獨印行的單疏本也能連繫到經、傳的解釋性上。因此，單疏本不是單獨的文本---雖然它的外觀是一冊單獨的書本樣式。僅僅視其「長相如何」確實會使我們抽離歷史與文化的脈絡去作出錯誤的文本形式分析。總言之，《春秋》在形式上極簡到像極了初始的 annals 大事記，然而卻也複雜到出現了千年以來綿綿不絕的解釋傳統與足以在「圖書館」中「考古」一輩子的上千冊的「《春秋》學」遺典。古人並不比今人笨，如果我們願意隨著生命與年齡承認此點的話，那麼，古人顯然沒有認為孔子的《春秋》「長得像」一部簡單的大事記文本。

《春秋》在作為「經」上，有著三「傳」來詮釋的歷史學術現象，使我們必須面對《春秋》作為一種歷史文本的敘事，²及作為「經」的文本時，探詢「義」之書寫，是否亦為一種「敘事」。然而，在表象上，如上述，《春秋》有類於Topolski的annals型，亦即它是樸型的、初始的文本，然而，這並不能解釋何以一種annals的敘事能具有一種供需意義之「原」的「經」。我們認為，《春秋》的作者在「書寫」時，就已於annals的形態上有意識的注入了一種「賦義」的書寫；因而，「釋義」者才能探及於文本中所蘊有之「義」。孔夫子針對古代史官的《魯史》而進行了「再書寫」，並且在「其義則丘竊取之」的情況下轉變了

²《漢書》〈藝文志〉中錄《春秋》於〈六藝略〉中，然仍以其為「古之王者必有史官」之「古史記」；《隋書》〈經籍志〉中則雖錄《春秋》於「經」部，仍以「史部」之「古史」類係源自《春秋》。

原來史官的「敘事」層，使得《春秋》成爲一部新的「再敘事」文本。也使得《春秋》從《魯史》的大事記之單條記錄性而轉成爲具有互文性的文本，這一轉向，正是在孔夫子筆削時所進行的「再書寫」及其「賦義」行爲中完成的，顯然《春秋》決非annals類型的「大事記」。孔門以降的後人，如果要探詢孔子書寫的《春秋》本文之敘事意義，皆必須依據三《傳》來進行---而不是依據古代史官書寫的書法。由於《春秋》與三《傳》的對稱，漢代以後兩者形成了的正是在經學體系之內的「經傳關係」，此即《春秋》之爲「經」（賦義）、三《傳》之文爲「傳」（釋義）此一文本對待關係的場域。

事實上，《春秋》作爲文本的形式，固然源自於史官，「長得很像」annals 或大事記，但卻不能以此理論來說明與判定它的內容「是」什麼與「有」什麼！

本文企圖自《春秋》中探求孔夫子的書寫，特別是其中有關於「未書寫」所形成的「空白」，如何是可能是一被孔子所「賦義」了的「敘述」，進行研究。《春秋》的作者---孔夫子，在進行一種自《魯史》而來的有意識的「敘事」與「書寫」，不再是如史官原本的書寫，每日每月每時依據著史官的書法傳統，條條的書寫與記錄。在《春秋》中，經過了孔夫子的「再書寫」與「賦義」的行動，《春秋》已然從「魯史」而轉變其存在之位所。《春秋》從泛稱各國之「史記」而至於專稱孔夫子所「賦義」的《春秋》，成爲《漢書》〈藝文志〉中「六藝略」之「經」的源頭之一，顯然其初始行動正是緣自於孔子的「再書寫」。無論考證孔子「有無」刪作作爲「魯史」的《春秋》，《春秋》之爲孔門諸「經」之一的認知，卻的確是三傳或五傳成立的要件³。經過孔子「再書寫」與「賦義」之後的新版《春秋》，內涵顯然已經轉變，若再用王安石式的「斷爛朝報」的觀點與說法以視之，顯然是類比於上述以annals的單條書寫來看待其形式的觀點，認爲這種單條式的流水記載而且是斷續

³ 所謂三傳或五傳，乃係根據《漢書》〈藝文志〉中所錄，〈藝文志〉中共錄了五種《春秋》之傳，其中傳至漢代的只有三種，《左傳》初始即爲書寫式的傳本，《公羊》與《穀梁》則本爲口傳式的傳本，在「書於竹帛」之後，得以保存下來；另外的夾氏與鄒氏則因無文本與無師說而失傳。

式的文本，在時間與意義上均不能趨於未來也不能含蓋過去。但自漢代以下，或者我們如果能對春秋末期至戰國時期的儒家經典形成史有更多的了解，那麼從「《春秋》」的「史記」通稱到《春秋》之為「孔子的」專稱，顯然已是漢人的歷史認知。《春秋》這部文本經過孔子的再書寫之後，它的敘述意義已經轉換成爲一個整體。在條與條之間已有其形成爲整體意義下的相互性，不能宣稱它是無關係的條與條的編輯簡冊而已，年代較早、排列在前的經文，反而可能在「再書寫」上是較晚的「書寫」，因此《春秋》十二公的「公即位」，反而以年代上最早發生的隱公之「不書」來宣示其整體性，含蓋到了其年代後發生的莊公、閔公、僖公等的「不書公即位」，這也就是爲什麼《傳》在解說經文時會成立「經」的「義例」之故，因爲對《傳》而言，《春秋經》是一部有互文關係的「孔子的」著作，而不是一部史官條條記錄的「現在敘述」。三《傳》的注家之解經傳，也是努力的尋求經文之間的互文關係以爲解經傳的依據，而顯然許多注家的相異觀點便是源自於互文的差異性，這種情形尤其在《公羊傳》的何休注與《穀梁傳》的范寧注那裏特別明顯，很足以讓我們看到注家眼中的《春秋》之互文性與孔子的書寫之重要關係。而解經時常見的依據年代在前的前條之文以解年代在後的後條經文，其實，正是來自於條與條之間的這種作爲整體意義下而成立的互文性認知。當然，互文性的關係，也包括了我們在本文中的主題，即看得到的有形經文與空白敘述之間的互文關係。

(二) 「闕文」與「不書」是《春秋》中「空白」態的兩種類型

視《春秋》爲有「大義」、有「微言」，視《春秋》爲有「義例」，視《春秋》爲「斷爛朝報」、「流水賬簿」；都是一個反映「怎麼讀」的問題。因而「不書」也就是對《春秋》在「這麼讀」之後，所提出的一種關於存在《春秋》之中的「原書寫」的問題之觀點。「不書」如果被提出來，就表示它曾被人「這麼讀」《春秋》過。本文即是認爲，可以從「不書」的角度去「這麼讀」《春秋》，冀圖通達《春秋》中來自

於孔子的「原書寫」；並會通存在於《論語》中被揭示的「闕文」觀點，視為「源」於孔子所書寫的兩種有關「空白」之表述。說「源」於，是因為不論從現存的三《傳》中的「經文」--《春秋》，還是《論語》，---前者是透過《傳》之傳主之「以文為釋」，後者則透過孔子之弟子(及再傳)之「記言」；雖然兩者皆有「子曰」或「仲尼曰」，都欲表示其所「記言」，就是「孔子的話」；傳《傳》者更認為，《春秋》不論是作或還是述，都來自於孔子。因之，上述兩種孔門之書---三《傳》與《論語》，便皆「源」於孔子而殆無疑義。「闕文」與「不書」雖非《春秋》中本有之詞彙，但卻被解經者用來指涉《春秋》中本有之行文狀態。兩個詞彙皆出自於孔門，前者首見於孔門弟子所編纂之《論語》，後者則見之於三《傳》與注、疏。在「闕文」與「不書」皆「源」自於孔子的認知下，作為一種「書寫」的符號呈現，兩者皆涉及到了敘述上的「空白」問題。敘述上的「空白」，即是「空白欲述」。而「源」於孔門的認知，「源」於孔子的再書寫行為，「源」於孔子對西狩獲麟的一歎，《春秋》中有著孔子對於「空白敘述」的「原書寫」。「不書」與「闕文」，便是本文意欲自「書寫學」探究的主題：孔子在《春秋》中的「書寫」中，是什麼讓我們能前去辨識出他老人家所注入的「空白敘述」？

《春秋》這部文本在「書寫」意義上的特別處，正在於我們不能僅僅將閱讀的目光指向文本中可視見的有形書寫，而更應當注意《春秋》文本中不可視見的字裏行間之非有形處---如果一定要說可以視見，那麼便是在印刷成書時所未雕版成「字」的「空白」處。透過《春秋》的《傳》，我們已經知道這一部份是有意義的；而且作傳者也認為這正是孔夫子「書寫」----作、述、刪、削《魯史》的精義與微言所在。那些字裏行間的「空白」，並不能因為沒有「字 / 文」的雕版，就視為是一種「未書寫」，相反的，這正是孔子有意的「不書」。

《孟子》與章學誠均以「文、事、義」三者以言孔子的《春秋》。然而，兩人均未曾意識到「不書」與「闕文」的問題，故他們用了「文」一字，來與「事、義」作串聯時，在彼意識中反映的是將「文」字一義推向「有形」的符號書寫性格；而尚未意識到「無形」符號納入「文」

的涉義意涵中。這樣就與「闕文」及「不書」成爲一對立態，而不能括「闕文」與「不書」爲言，即「無形之文」也是「經之文」、也有「事」與「義」。所以，雖然「事、義」一定要透過某種符號來呈示或呈現，但卻不一定是「文」---有形之文。而可以是「闕文」。「闕文」在此明顯地與「文」相對立。此一符號，也可以是「言」---即「口說」。這樣，就更不必是有形書寫的「文」。這些，都可以與孟子與章學誠的「文」對立起來，而爲他們所談的「文、事、義」之「文」所不能涵括。也表示，在他們的「文」之外，也尙更有「文」---這就是本文所要談的「闕文」與「不書」。

「闕文」在此明顯地與「文」相對立。「不書」則與「書」形成了字面上的對立。既然如此，「闕文」與「不書」何以能是孔子的「書寫」？有其「敘事」呢？《孟子》談「文、事、義」處在〈離婁〉篇下，云：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⁴

《孟子》此處的「文」義，趙歧注云：「其文，史記之文也。」孔穎達疏云：「故其所載之文，則魯史之文。」將「文」指向「史書」之「文」。朱子則注云：「春秋，魯史記之名。」又云「史，史官也。」不論是史官還是史記，然則孔子所以爲「義」者，在於憑取「舊史之文」或「史官所記」，以成其爲另一個文本的「再書寫」與「再敘事」。只是，《孟

⁴在《孟子》的〈滕文公〉篇中，有另一段對於孔子與《春秋》關係表述的文字。其云：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在此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孟子對孔子與《春秋》之關係，乃是從「賦義」行動，也就是從對魯史的「其義則竊取之」來理解孔子的「知我與罪我」。

子》的「文事義」之「文」，無論是史官之文還是史記之文，都還是限制在可視見的「有形之文」，而尙不能「及」於不可視見的「空白敘述」。

(三)「文」之書寫與「空白敘述」

案、孟子所謂的「文」，以現代的觀點而言，實應有三種「書寫」狀態可以指出：一是「已書寫」的「文」。二是以「不書」爲「已書寫」，此種「文」係不可以「有形」視見之「文」。「已書」與「不書」皆是「已書寫」。三是「史之闕文」之「文」。這三種「文」均與早期史官之書寫學有關，不論是「書」、「不書」、「未書」，皆是「書寫」之「學」。尤其不書與未書，更是涉及史官之專門之學的傳統，故孟子曰：「其文則史」。孔子則曰：「其義則丘竊取之」。蓋史官之書寫學，自孔子以下，發展成爲以《春秋》爲典範與源頭的經傳之學，成爲另一條不同於史官傳統的學術路線與學問體系。

然而，無論是史官之書寫，還是孔子之書寫，依孟子之言，其書寫當具有「事與義」，其「事與義」在「文」，「文」則在於「書寫」。「文」之「書寫」有「有形」---即「書」；亦有以「無形 / 空白」而「書寫」，則是「不書」。而「空白」之敘述除了「不書」之外又另有一種，即「待書寫」之「闕文」。故自「書寫」言，有二焉：「已書」、「未書」；「已書」有二種：「書」與「不書」，此二種皆是「已書寫」。自「空白敘述」言，亦有二焉：一是「不書」，一是「闕文」。前者爲「已書寫」，後者爲「待書寫」，即「傳疑」或「闕疑」之義。

二、論「闕文」

「闕文」一詞出自《論語》〈衛靈公〉篇，曰：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論語》中提到「文」字之處實多，唯以「文」「史」相並提者，

僅有二條，除「史之闕文」條外，尚有〈雍也〉篇所云：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先說此條，依朱子注解，「文勝質則史」一句意謂「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朱子係以「誠」與「質」等義來釋「史」，無論是否原意，似乎仍算是講得通；因此，依朱子之釋，徒「誠」也是不足的，因為要能成為君子，還是要有「文」；「史」若要上達為「君子」，就必須「文」「質」兼備，方能「彬彬」。以「書寫」而論，其掌文字及記事之工夫，不僅須有「文」，亦須有「質」，兼備方為是。而或者孔子意味方今之「史」，徒「文」為多，而「質」卻不足；此即包咸注所云「史者文多而質少」之意。⁵

上引前一條中的「闕文」依近人胡適、周策縱、沈剛伯的解釋，是「闕『文』」，即是「文勝質則史」之「文」，其「文」義等同，上述諸人均有自傳統上漢儒之注的主流---以「字」訓「文」---而轉向以「文飾」訓「文」。⁶因而「史之闕文」照周策縱的看法，簡單的說，就是

⁵ 何晏《論語集解》(台北：新興書局，校永懷堂本)，卷 6，雍也篇，頁 29，包咸注。

⁶ 胡適的論文〈說史〉本為「釋史」而作，屬於晚清以來吳大澂、章太炎、王國維、朱希祖、勞榘等學者脫離許慎《說文》「釋史」的另一個近代脈絡。惟其中因有引證《論語》之言「史」處，而提出了「我以為『史之闕文』的『文』字，也應該作『文采』『文飾』解」，又曰，「現在流行的『史』，都是那華文多過於實事的故事小說了。」胡適關於「史文」的解釋，再明顯不過了，充滿他近代性的烙印，以致於從「文」想到「華文」想到「故事小說」，與他釋章學誠的「六經皆史」正好可以相參。周策縱繼承了胡適的「文飾」新解這一方向，雖然他對於胡適的古典功力稍有批評，但畢竟近代新解的提出而且與舊解「以字訓文」相抗，周策縱還是推尊並繼承了胡適；周氏進一步的將「有馬者借人乘之」這一未能徹底解決的舊題再度與「史之闕文」聯繫起來，意圖在新解上釋清；接下來的沈剛伯氏，很明顯地，儘管他在論文中完全沒有提到胡適與周策縱，但他仍是繼承著意圖重解《論語》中「史之闕文」這一條軸線上的後繼者。參見周策縱〈說「史之闕文」〉(大陸雜誌，卷 37，第 4 期，頁 4-22。)及其文中提及引述胡適〈釋史〉的部份，頁 14-16。

「史官的闕少文飾」；沈剛伯氏亦斷其義為「文飾」，而非「文獻」之「文」。「史之闕文」在沈氏看來，就是「史」已闕少那種「文飾」之書寫工夫了，因此是「質勝文」之「史」。沈氏顯然意在通釋二者之「文」而作句意會通。⁷則在沈氏，「質勝文」句實可轉換為「闕文(飾)」一詞，然轉換中，「闕文」一詞用一「闕」字以表，殊為奇特不倫；且「質勝文則野」一句，亦不似孔子言「吾猶及史之闕文」之嘆詞。「吾猶及史之闕文」既是一嘆詞，表示其有意義，然斷不會言其「野」。「史」與「野」當如何連繫，方能喚起孔子之歎：「吾猶及史之闕文…今則亡矣夫！」在孔子之歎中，「闕文」當有其意義，要之，沈氏以「文飾」與「野」所作之相對連繫，實難「及」於孔子之歎。

上述胡適、周策縱、沈剛伯等諸氏所提出之近代新解，實與漢儒多釋「闕文」之「文」為「字」，意已有不同。要之，「史之闕文」被釋係史官為文時之「闕文飾」，自然是視其為一種「史官」之修辭的學問，修辭的學問也就是敘事與書寫的學問，史官要能「文飾」，自然必須要實踐到「書寫」才能成就其「敘事」；而「書寫」又自必涉及「文/字」，是故從這個角度來說，先不論「史之闕文」的「文」之確解為何，「文字」與「文飾」在「書寫」與「敘事」上有其可以相通之處。因此，「文飾」如果不強聯繫到「文勝質則史，質勝文則野」的話，胡適與周策縱等人確實已提出了一個研究「史之闕文」的書寫 / 敘事學的新看法。

「文」的解釋遂與此有相互關係，漢代注家大體上皆是訓「文」為「字」。「文」若訓指「字」，則「闕文」實有兩義可說：其一，係以「闕文」為「不識字」之意，亦即「書寫」上的「闕疑」之義。如何晏《論語集解》所引包咸所注云：

包曰：古之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⁸

⁷ 參見沈剛伯，〈論語上所說的「文」、「史」與「文學」〉，《大陸雜誌》卷48，第2期，1974.2，頁1-4。

⁸ 何晏，《論語集解》，校永懷堂本，卷15，頁69a。

皇侃《論語義疏》亦曰：

史者，掌書之官也。古史為書，若於字有不識者，則懸而闕之，以俟知者，不敢擅造為者，孔子自云，己及見昔史有此時闕文也矣……當孔子末年時，史不識字輒擅而不闕，……故云：今亡也矣夫。

此即訓「文」為「字」，由是主張「闕文」乃是因「不識字」而「不書字」，「懸字」而「闕」之，以謹守史官在「書寫」上的「闕疑」原則。其二則為「闕字」之義，注意「闕字」與「懸字」之不同。前者乃是緣于史官在書寫上的「不識字」，因而不敢下筆書寫以「待知之者」；後者則是緣於史官對傳統文獻的閱讀有了「不識字」，因而闕之，亦以「待知之者」。

尚有一種情形，亦可歸類為閱讀上的不敢擅讀，因而謹守「闕文」的原則與傳統。此即在已經完成的文字作品中，有「字」因「殘闕」而呈現出一種在閱讀上的無法辨識，此種狀態亦復可以解釋為「闕文」，良史在閱讀時，若遇有此種狀態，則亦不敢「擅識」而「擅釋」。如漢代石碑，凡遇殘片剝削，而無法呈現原本文與字之狀態時，亦即「殘闕」時，則「闕字」，在校讎登錄上便以「□」表之，「□」正是一種「闕字」的狀態之表示符號。今傳漢代石經拓本《公羊傳》中，便因殘片剝削無法辨識，或是其字已脫落，而皆以「□」表之。待有人識或得它本漢代本文足能證時，便能補之，是故「□」為一有意義的符號，可以表達「闕文」之狀態。⁹

由上述，「闕文」之「文」若訓為「字」，則「闕文」可以有兩種緣於史官之書寫與閱讀而來的「闕疑」之狀態，兩者所緣均在於史官的不識與不足，然而不識與不足並非所當批評與感嘆的重點，重點在

⁹ 近人呂振端撰有《漢石經公羊傳殘字集證》(新加坡:新加坡文化研究會,1985.12)一書,卷3為〈漢石經公羊傳部分復原圖〉,其中不可識者,則以「□」表之。在卷二〈校文〉中相對於公羊殘片圖影,釋文(校文)對於殘片所「闕」的部分,則直以空白來表示。

於不能「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的「闕文」。在孔子之時，「識字」顯然爲一種「文化」上的大事，「史」則與此有關，故後來終於發展爲漢代以「史」爲「文字官」、爲「掌書令」的官與職司，如太史、蘭台令史之類；「史書」則爲「識字之書」。孔子此語，從何晏與皇侃所注的脈絡來理解，意謂史官識字水平已不足，遇有書寫上的不識之字，則逕隨自意轉換爲其它能識之字或當今用字，造成認知上之懸差，影響了書寫的品質。包咸與皇侃所談的均是史官的「書寫」之「不識」所必須的「闕文」守則；筆者則更進一步認爲：史官所司，不僅爲書寫之職，也更在經由文本的閱讀而成爲傳統的解讀，孔子所談的「史之闕文」顯然涉及的是古今傳承與轉換間的「文字」掌控能力與詮釋能力以及其中所累積出的書法規則之智慧。此所以孔子主張要「闕文」，涉及的正是文化傳統的保存與傳承，不僅在「文」中，也更在文本的「字」中，「闕疑」正是遇有「不識」之「字」時，所應當遵行的有關「書寫學」的學識與學養。包咸、皇侃所談的是孔子主張中書寫的一面；而尚有閱讀的一面，如此方能構成史官在傳與承的職責上對傳統與文化的承擔。遇「字」不識，應當「懸之」，解「闕文」爲「待書寫」的「闕疑」；同時，在面對傳統傳下的寶書與文本時，史官必須解讀之，在閱讀之際，遇有不識或不能通之字，史官也同樣必須要能遵守闕疑的原則，不敢擅爲釋之，作當代語言文字的隨意轉換，以待知者。而「闕字」則爲另一種由「已書寫」而至於「殘闕」，以是必須要以「□」表之的「待閱讀」以「補之」。於是，我們乃可以了解「史官」進行「書寫」或是對「古書」的「解讀」時，必須有一種「闕文」的謹慎與認知，傳統已經在其手上，無論是對於「古」之「解讀」或是對於「未來」之「書寫」以流傳，一字之異，都有可能牽涉到其所承擔的責任，史官的書寫學於是在「不識」或是「不足」時，皆應當以「闕文」的態度來面對：或「闕疑」而「懸字」，或「闕字」以「□」表之，以待後之識者與足者。清初顧炎武《日知錄》中即有〈春秋闕疑之書〉一條，即以爲「闕文」係因夫子「闕疑」謹守之故。¹⁰其云：

¹⁰ 顧炎武，《日知錄》（台北：明倫出版社），卷4，頁83-84。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史之闕文聖人不敢益也。史之所不書，則雖聖人，有所不知焉者。……而經生之論，遂以聖人不知為諱。¹¹

綜上述，則此條之解，似有二種取向可以判讀出：1.「史」為文書或文字，2.「史」為史官。無論是前者或是後者，「闕文」均指向「書寫」、「書寫者」及其「書寫成品」之關聯。若此，則「史之闕文」一句，誠或可以以《論語》〈八佾〉篇中孔子所云的另一句話聯繫與理解。孔子在此篇中所云為：

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¹²

孔子所云，道出了三個階段的程序：文獻——足「徵」——能「言」。足與不足，皆與文獻有關，「文獻足」，方能為「徵」¹³。這裏的「文獻」，依注家之解，是「文」與「獻」各有所指。朱子注云：「文，典籍也；獻，賢也。」前者指可以透過「閱讀」而得到「能言」的對象；後者則指可以透過「口頭探詢」而得到「能言」的對象；兩者皆指向「探詢」的所在則一。通過「文獻」則能「徵」之的意思，依朱子所注之意，是孔子認為在「夏禮」、「殷禮」那裡原有的「空白」處因「文獻」的「擁有」而能「徵之」，亦即「空白」透過「文獻」而填補上了。夏禮與殷禮也遂「能言之」矣，「能言」乃成為真正的「能言」。¹⁴朱

¹¹ 同上註引書，頁 84。

¹² 何晏，《論語集解》(台北：新興書局，校永懷堂本)，卷 3，八佾篇，頁 15b-16a。

¹³ 何晏，《論語集解》注引包咸曰：「徵，成也。」朱熹，《論語集注》(《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1.1)則注為「證也」，頁 63。

¹⁴ 這樣的解讀乃是依朱子之注的解釋，是故朱子注「徵」為「證也」。與包咸注的用字頗不同。若是依漢儒之注解，則可能更有主體性的意義，尤其「文獻」二字的解讀，與近代對「文獻」成其為「詞」的印象，有著相當的差距。在校永懷堂

注云：

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
而二國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

本與阮元校勘注疏本的何晏《論語集解》中，上引文本的章句係分為二，即「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為上句；「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為下句。上句何注引包咸之注以為解，下句何注引鄭玄注以為解。何晏「集解」對注所放置的位置，很顯然是將孔子所言作了上述的章句之分。何晏的集解本後來為皇侃的《論語集解義疏》與宋代官定本邢昺之《論語注疏》繼承，由是，我們認為，古義遂沒。何晏的章句未必為古義，我們所持的理由即在於其與何氏所自引的鄭玄之注義相悖。案、鄭注云：

獻，猶賢也。我不以禮成之者，以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何晏、邢昺，《論語注疏》，阮元校勘本，台北：大化書局，卷3，頁5b。
校永懷堂本何晏《論語集解》，卷3，頁16a。）

明顯地，「文獻」一詞並未如朱子與馬端臨《文獻通考》般那樣的使用，並具有自足意含，更遑論近代意義下的「文獻」一詞。鄭注中的「文獻」，必須要聯上句為讀，「文獻」一詞才見生命上的主體性，而且此詞決不指「學問」，乃指「杞」「宋」二君的治國能力與成效。由於杞、宋二君在「文(章)」、「賢(才)」上的不足，使得「杞」「宋」二國雖為夏、殷之後，卻無法「成 / 證」孔子的「能言夏禮」；如果此二國的「文章」、「賢才」皆「足」，那麼就能「成 / 證」夫子「吾能言之」的「夏禮」了。由鄭注看來，他以為孔子之意仍然在討論「夏禮」與「治國」之關係，而且此一有「文」有「獻」的「夏禮」，孔子是能言的，顯然孔子對「杞」「宋」二國的「文獻」有一份失落感，遺存在鄭注中的孔子對弟子的言談中。由是，筆者以為，依鄭玄之注，「文」與「獻」應有一個主格，鄭玄注即以為此主格當為二君，二君無文章亦無賢才，則自然不能「成就」其所治之二國。是故這一段本文的解讀應當是上下兩句聯讀，「文獻不足故也」也應當聯上句而不應斷開。「文獻」與「杞宋」、「足徵」的關係其主體性應在具有實踐可能的「杞宋二君或二國」在當時孔子所視見的情境中呈顯其義，而不在「文本」型態的「文獻」之中來「證明」孔子所能「言之」者的正確與否。朱子與馬端臨的讀法，正是以「文章」與「賢者」為一具有自足性與對象性的客體而可待他人來探問者。

取之，以證君言矣。¹⁵

這種說法，頗令人聯想到近代史學的「史料觀」，無論是書寫式史料或是口述式史料，得到史料便能進行研究上的徵實工作，從史料那裏展開「歷史」的擁有過程。惟這種看法，雖然頗符胡適釋章學誠「六經皆史」的以「史」為「史料 / 文獻」的觀點，卻全然不符漢儒對於「文獻」的理解。

《論語》中的「文」與「獻」，有分解、有合解。大體上自漢儒迄宋乃至近代，「文」與「獻」之解的趨向乃是由「分解」而向「合解」演變的。在漢儒那裏，是分解；後來自南宋朱子、馬端臨《文獻通考》以下，尤其是近代以來，漸轉成爲一個同義詞藻，有專指「書寫成品」的意思。朱子雖仍知古義，分解「文」「獻」，然在「徵 / 足」之論上，「文獻」已是作爲取證的合詞，而覺無鄭玄的「杞 / 宋」二君的主體性。馬端臨雖也區別「文」爲「敘事」，「獻」爲「論事」，但已專指「文獻」---「書寫成品」的意指則一。逮至近代，受西方影響，「文獻」即「史料」、「史料」即「文獻」，「文獻」仍爲一合詞之義，而與「史料」一詞可通。無論是梁啟超的〈新史學〉這篇具近代里程碑標誌性的文章，還是他在清華國學院授課的名著《中國歷史研究法》書中所用的「史料」一詞之出現，或是傅斯年創辦《史料與史學》期刊之〈發刊辭〉中所述的「史料」之義；在我們看來，都與張舜徽的《文獻學》或是其它尾隨著作的「文獻」一詞可以相通互用，顯示著「文獻」一詞在近代以來仍爲一合詞，通過外來新語彙「史料」來成就其新的內涵所指，但仍保留著「書寫性成品」的特性！這樣說來，從近代性的意義下去解讀《論語》中的「文」與「獻」，必然就是「合詞式」的「文獻」之解，並且還是一種「史料」同義詞下的解釋。因此，從近代性的讀法切入，則「文獻不足徵」，既是「文獻不足」的「史料不足」；也是文獻/史料之「不足徵」；「不足」的意含相當明確，都是「書寫品」，與漢儒鄭玄之指向以「二君」爲主體，顯然不同。則漢儒意義下的「史

¹⁵ 朱熹，《論語集注》（《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卷2，頁63-64。

之闕文」與「文獻不足徵」之聯繫，與宋儒解注中對此二句的聯繫，及近代學人對此二句從「文獻」合詞以及「文獻即史料」來定意「足能徵之」的聯繫，若從「闕文」的「不識則闕」與「文獻」的「不足／足徵」之解義以觀，則恰好反映的是源自「《春秋》學」而來的「空白」態的「闕文觀」與「文獻觀」的聯繫大要史略。顯然是如此，近代史學中的「史料／文獻觀」皆可在解讀《論語》的「闕文」時仍然反映出一種被近代學人不曾言說過的有關「空白」存在的問題，被「蘊藏／遮蓋」在「足徵／不足徵」的討論中，近代學人尚未意識到它與《春秋》中「書寫學」的聯繫。

進一步為言，既然孔子的慨嘆來自於「杞宋」之「不足徵」；那麼，「吾能言之」的「夏禮」，又是如何而得其所言呢？應當還是來自於「文」與「獻」。「杞宋」之所乏與「不足徵」，正是孔子之所能言及其能言者之所從來的「足徵」：「文」與「獻」之於孔子所能言之的「夏禮」，無論如何，畢竟已是一其所慨嘆「不存」，由是在與弟子談到「杞宋」之「不足徵」時，其失落益深。而「夏禮」既然已非孔子時代的當下實存，則無論是「杞宋」的「文與獻之足徵」，或是孔子取以為「能言」之所從來處，畢竟都應當還是源頭於已經非實存的「夏禮」。這樣，「文獻」一詞的意義轉化，從鄭玄的「杞宋二國」至於朱子的「文獻」，而更至於馬端臨的以「文獻」為「敘事與論事」，便有了孔子慨嘆中的「文獻」成其為「文本化」的必然性，畢竟「歷史情境」的移轉已在孔子的慨嘆中發生與面對。

在《漢書》〈藝文志〉中的一條資料，也可以作為佐證吾人由「文獻足徵」此一條通達於「史之闕文」理解的進路。〈藝文志〉「小學」類述云：

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無矣夫！」蓋傷其不正。

此處極為明顯，班固〈藝文志〉中論及小學，以為《論語》中的「史

之闕文」，「文」當爲「字」訓，故屬列小學類而論之。而「問諸故老」以求之，正是引述與聯繫了《論語》中的「文獻」一詞，可見班固對「文獻」與「徵」的解釋，尚不同於後來的包咸與鄭玄，仍是從「史」與「闕文」的角度來解，而使得「闕文」與「文獻」皆可以在〈藝文志〉與〈七略〉的體系中，自「小學」的角度來解。許慎《說文》亦云：

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也夫！蓋非其不知而不問「闕」；人用己私，是非無正，巧說衰詞使天下學者疑。

可見許慎亦以爲如果「不闕」，便會造成「亂書」---即「穿鑿」。許慎的理解是一種「闕疑不識」的路子，與〈藝文志〉的「不足則闕，問諸故老」之不同略可以分辨出：後者實是一種「文獻不足有闕」的路子。但無論是前者的「闕疑」或是後者的「闕文獻」，兩者皆是譏評一種「不肯闕」的態度；一如胡適解「闕文飾」，指的也是一種「不肯闕」態度的缺乏，致使「書寫」成爲益趨華而不實的「小說」而非「史書」，也仍然是在「書寫」與「敘事」上談「闕」！

關於《春秋》中的「闕文」，我們可以幾個比較爲人所熟知之例以爲闡述。其一爲「夏五」。魯桓公十四年，《春秋》經載云：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五。

先看《左傳》及其注家。《左傳》於此條經文無傳。杜預於經文之下注云：

不書月，闕文。¹⁶

¹⁶ 杜預集解，相臺岳氏本《春秋經傳集解》，卷2，頁64b。

明白以「闕文」爲注之解。可見杜預極爲明顯的以「夏五」爲「夏五月」之「闕」。值得注意的是杜預在表達此一「不書『月』」的「闕字」之義時，用的正是從《論語》那裡傳出而經漢儒在前述脈絡中使用著的「闕文」一詞。

《公羊傳》云：

夏五者何？無聞焉爾。¹⁷

《穀梁傳》云：

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¹⁸

傳文反映的，正是過去與現在的時間距離已經久遠，因此，所傳當有其「闕」處，故以「經文」乃是一種保存「闕文」的「傳疑」筆法。范寧更注云：

孔子在於定哀之世，而錄隱桓之事，故承闕文之疑，不書月，明皆實錄。¹⁹

范寧此注，不僅表明了《春秋》經文「是」孔子所書、所著的一種注解經傳之態度與位所，抑且，注文中還用了傳統上相承的「闕文」之辭，及其與「闕疑」之關係。更者，六朝時在「史學」中興起的「實錄」一詞，也被范寧用來與「闕文」、「傳疑」作了直接的聯繫。

其次爲經文莊公二十四年冬書「郭公」之例。三《傳》於「郭公」之經文斷句實異，是經文之異而有傳文之異。《左傳》依杜預「集解」本，此條經文書爲：

¹⁷ 校永懷堂本《公羊傳》，卷5，頁33a。

¹⁸ 校永懷堂本《穀梁傳》，卷4，頁26a。

¹⁹ 同上註。

(經二十有四年。冬。)赤歸于曹。郭公。²⁰

《公羊》與《穀梁》之經文則同，同斷句爲：

(二十有四年。冬。)赤歸于曹郭公。

案、此條經文之書「郭公」，《左傳》與《公》《穀》最大之歧異，在於杜預使「郭公」爲單獨一句，並不聯上「赤歸于曹」爲句。以是杜預將「郭公」視爲經有「闕文」。杜預於經文「郭公」下注云：

無傳。蓋經闕誤也。自曹羈以下，公羊、穀梁之說既不了，又不可通之於左氏，故不采用。²¹

可見在經文「郭公」此處，《公羊》與《穀梁》是作了與「赤歸于曹」的聯讀，因而不僅經文無闕亦無誤，反而皆發傳言釋其意義；而《左氏》則無傳，杜預之注則將經文視之爲有「闕文」之誤。這是一個只有杜預與《左氏》視《春秋》經文有「闕文」而《公》、《穀》不與之同的可對照之例。由於涉及的不僅是傳文對經文的解釋差異，而更因此而「及」於三《傳》所據以「發傳 / 不發傳」的「經」本身之差異。或反之是先由於《左氏》與《公》、《穀》之「經文」的差異，兒後始有三傳及注家在傳釋與注釋理解上的差異。

第三個例子，爲桓公五年春正月的「甲戌己丑，陳侯鮑卒」經文何以出現了兩個「日」？據《穀梁傳》傳文發傳所釋，云：

鮑卒何為以二日卒之？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之也。

²²

²⁰ 相臺岳氏本《春秋經傳集解》，卷3，頁78a。

²¹ 相臺岳氏本《春秋經傳集解》，卷3，頁78a。

²² 校永懷堂本《穀梁傳》，卷3，頁20a-b。

是《穀梁傳》主張此處是夫子的「闕文」與「傳疑」之筆，故為「闕疑」之書寫；且將其「傳疑」之「闕文」從時間性上縮限在甲戌、己亥兩日之間。故曰：「舉二日以包之」。范寧在此所下的注文，又復以「實錄」一詞來作為傳文「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的同義詞，故注曰「明實錄也」。

而《公羊》則發傳云：

曷為以二日卒之？愷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²³

何休注曰：

君子，謂孔子也，以二日卒之者，闕疑。²⁴

《公》《穀》二傳所釋，其實無異，皆以「闕文」之「闕疑」、「傳疑」義釋之。《左傳》與杜預所釋，則以「再赴告」為事實，故有二日之書，再赴之故，則以陳亂也。顯然所視與《公》《穀》二傳不同。²⁵

三、論「不書」

²³ 校永懷堂本《公羊傳》，卷4，頁26b-27a。

²⁴ 校永懷堂本《公羊傳》，卷4，頁27a。

²⁵ 《左傳》載云：「傳。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杜預注云：

甲戌，前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己丑，此年正月六日。陳亂，故再赴。赴雖日異，而皆以正月起文，故但書正月。慎疑審事，故從赴兩書。（相臺岳氏本《春秋經傳集解》，卷2，頁58a、58b。）

是杜預以為經文書兩日之故，為陳亂故有再赴。然杜預復又推歷以為兩日實不同月，則夫子何以將不同月之兩日，同書於五年正月之下，杜預所釋，似不能盡解經文。但以「慎疑審事」為說，實無「闕文」與「闕疑」之義，故與《公》、《穀》兩傳不同。

「不書」一詞並未出現在《春秋》經文中，但並不能就此而下論斷曰《春秋》中沒有這個關於書寫學上的現象，否則三傳包括注家便不會成立一個「不書」的詞語，來揭示這個書寫學上稱之為屬於孔子書法的「空白敘述」。如果《春秋》與孔子的書寫/再書寫無關，那麼《春秋》中便不存在所謂的以「空白」為「不書」的書寫學專門詞彙，而只能歸類為一種史官或流傳過程中的「闕文」。是「文獻不足徵」的「文獻學」問題，而不是經學上的「不書 / 書法」的「書寫學」問題。

顯然因為《春秋》本身沒有這個「不書」的詞彙之出現，而被稱之為「不書」的書法與義例，又只能是一個「空白」狀態的現象，要將遍佈於有形字彙書寫之外---而又隸屬於《春秋》之中的「空白」狀態之現象，轉成為一個可以辨識的「已書寫 / 不書」，---不僅不是古史官的「闕文」，還得是出自於孔夫子的有意圖的作者行動---「不書」，三傳面臨的，正是這樣的挑戰，要將「空白」納入經文之中，並與有形經文合成為《春秋》的意義整體。三傳與注家必須成立一套論述，反對者亦然。

「不書」一詞雖未出現在春秋經文之中，但在三傳的傳文中卻皆有此一詞彙，或是近似的「不言」、「不稱」等。²⁶由三傳之傳以釋經

²⁶ 《公羊》與《穀梁》之傳文雖皆有「不書」之詞，然多是出現在「不書葬」之傳釋脈絡中，未見有以「不書為書」之用法。兩傳中以「不書為書」義之用詞，多以「不言」出現。此隱、莊、閔、僖四公之下傳文所用詞皆然。推其故，或與兩傳之「口傳」性有關，與書寫性文本的「不書」義，似可以相照。

其次，《左傳》傳文中所使用的「不書」一詞，也未必皆是本文中所謂的「空白敘述」之意涵。有時指「史所不書」，與孔子無關，孔子並未以杜預所謂的「即以爲義」去承擔轉化。這種「不書」，對孔子而言，就是孔子的「不書寫」或「未書寫」。《左傳》傳文中許多「無經之傳」的傳文中，都出現了「不書」之詞，但並不能視為是經文中的「空白敘述」之「不書」義。如隱公元年經文無「夏四月」，而傳則有之，曰「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傳文所言「不書」雖是釋經文何以「不書」夏四月事，然實是經文之「未書寫」義，與本文中所謂夫子以「不書」為有義之「空白敘述」者不同。又如隱公元年經文亦無

的性格，「不書」顯是後起，由傳主使用之而指向經中以釋其義。前節中筆者曾謂「空白」何以能「及」？則三傳之言「不書」，正是爲了成立《春秋》中之「空白」有義可釋、有意可言所成立的一個詞彙，用此詞彙來通達夫子於《春秋》中之「空白」處有「已書寫」之「在」的表述語言。換言之，在筆者看來，《傳》中「不書」一詞，正是爲了在語言上能「及」於夫子之「空白」狀態所「書寫」的意義。有了「不書」一詞，三傳與注家便可據此以言諸「空白」處的因「書寫」而來的「敘述」之義。晉代杜預於〈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序〉中云：

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

杜預撰有《春秋釋例》，今有輯本，²⁷顯然杜預調和了今古之說，而歸「例」於「經」，然又不謂《春秋》每條經文皆有其義例，故曰「因行事而言，傳直言其歸趣」。在其言《春秋》經文有義例之處，有意思的是他對孔子的「賦義」，從書寫學的角度作了一次歸納，此即將「書」「不書」「書曰」「先書」「故書」等皆曰「之類」，統視爲是孔子「起新舊、發大義」的「變例」；而「史所不書」的部份，亦有孔子的「即

「八月」之書事，而傳則云「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意同。

²⁷ 案、杜預專治《左傳》之學，故其解經之書則題名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是現存合「經」與「傳」爲一以成「經傳集解」文本之始，迄今莫能廢之，清儒雖欲回復其前經自爲經、傳自爲傳之獨立狀態，終不能成，故阮元刊印十三經暨校勘記，仍以杜預本爲左傳之代表。其「釋例」之書，則有《春秋釋例》，由孫星衍與莊述祖自《永樂大典》中輯出，此書題名「春秋釋例」，自是由《左氏傳》入手而以釋《春秋》之「經例」。

以爲義」，稱之爲《春秋》「新意」。「變例」與「新意」，皆是孔子的賦義，杜預之所以特在〈序〉中分別言之，正是爲了表明「變例」中的「不書 / 不言」與「新意」中的「即以爲義」，兩者雖然皆是隸屬於孔子的「空白敘述」，但從書寫的角度，卻仍有其區別，前者乃是孔子自爲的「不書」，後者則是來源於所憑藉的「史所不書」之文本，不去進行「不書」的「書寫」行動---如刪、削等，而是直以文本中的另一種「空白」態轉換成爲自己所修《春秋》本文中的「空白」態：前者即是史官的「闕文」或是史官的本就「未書寫」，孔子將「未書寫」轉成了「不書」的「已書寫」，但在這個孔子的轉換與賦義過程中，孔子並未動筆---包括增字的「書」或是減字的「刪削」，杜預特別標出這一點，視它爲「春秋新意」。杜預雖然在序中分別了兩者而言之，一置於「變例」爲言，一置於「春秋新意」爲言，以成立他的「發凡」之周公「舊章」與「不言凡」的孔子之「新意」；然而，杜預既然以「之類」爲孔子的《春秋》中之「書寫」作了「類聚」，則「變例」中的「不書 / 不言」與「新意」中的「史所不書 / 即以爲義」從書寫學的角度來看，其實是相同的「經文狀態」---即皆爲《春秋》中的「不書」之「空白敘述」，「舊章」或「新意」皆然，皆須向「空白」處求之。

因此，杜預序中的諸「書」字皆可以通「書寫」爲訓，惟「不書」一詞爲特例，在其文脈中不可以「書寫」訓，否則即不通矣。杜預並未將「不書」直接歸屬爲孔子之「未書寫」，而以爲係史官之「未書寫」，孔子的行動在其用詞則爲「即以爲義」，這是一種間接型的賦義，與《公》《穀》之直接將「不書」視爲孔子的「筆削」行動，顯然有著直接與間接的不同意會。

在杜預《春秋釋例》中，彼實已知「闕文」與「不書」之區別，其云：

去聖久遠，古文、篆、隸歷代相變，自然當有錯誤，亦不可以拘文以害意。故聖人貴聞一而知二，賢史之闕文也。今左氏有無傳之經，亦有無經之傳；無經之傳，或可廣文，無傳之經，則不知其事。又有事由於魯，魯君親之而復不書者。

先儒或強為之說，或沒而不說，疑在闕文，誠難以意理推之。

28

「闕文」之疑，「事」不可見，則「義」亦難推通；故杜預遂以「經有闕文」視之，以闡釋經中之「空白」態，其一即為「闕文」，有此義與例，故可以闕疑以釋經，而不必曲為附會，強生其義與強為之說。此其故曰「疑在闕文」，無文獻可為徵，「誠難以意理推之」也。其二、經有仲尼「不書」之「新意」。杜預於《釋例》中曰：

仲尼《春秋》，皆因舊史之策，書義之所在，則時加增損，或仍舊史之無，亦或改舊史之有。雖因舊文，固是仲尼之書也。邱明所發，固是仲尼之意也。雖是舊文不書，而事合仲尼之意，仲尼因而用之，即是仲尼新意。²⁹

一如杜預在〈春秋經傳集解序〉中所言，杜預仍以《春秋》中所出現的、且由舊史官所未書寫而留下的「空白」態，經歷了由孔子所承擔的「再書寫」此一程序而方始能稱之為「孔子的《春秋》」或「孔子的經」；因此，雖是舊史所不書，而卻已在《春秋》中轉成為孔子所賦義的「新意」---即是「不書」。

在孫星衍與莊述祖所輯校的《春秋釋例》十五卷中，並無「經闕文」例之名目，但在《春秋正義》中，孫、莊二氏自《正義》所引用之杜預文字輯出了一卷〈終篇〉，專以言「諸雜稱」，此輯篇附放在二氏所輯《春秋釋例》的卷十五之末。其中有一條與「闕文」有關。魯莊公 22 年，經文：

²⁸ 孫星衍、莊述祖輯校，《春秋釋例》(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80)，卷末，〈終篇第四十六〉之〈諸雜稱二百八十有五〉，葉 3a。案、二氏於〈終篇第四十六〉下校注云：

案此篇永樂大典全闕其篇，目則見孔穎達集解序正義。

²⁹ 本文亦是孫、莊二氏自孔穎達《春秋正義》中所引述之〈集解序正義〉輯出。見孫星衍、莊述祖輯校，《春秋釋例》，卷末，〈終篇第四十六〉之〈諸雜稱二百八十有五〉，葉 3a。

夏五月。³⁰

《春秋釋例》〈終篇第四十六〉云：

年之四時，雖或無事，必空書首月，以紀時變，以明歷數。
莊公獨稱夏五月，及經四時有不具者，邱明無文，皆闕謬也。

31

是杜預視此條經文爲有「闕文」。此條既是《春秋正義》所引自《春秋釋例》者，或者《春秋釋例》中之「釋例」原即有「經闕文例」。此條經文三《傳》皆無「傳」，《公羊》有何休之注，《穀梁》有范寧之注，《公羊》何注云：

以五月首時者，譏莊公取仇國女，不可以事先祖、奉四時祭祀，
猶五月不宜以首時。

范寧《春秋穀梁傳集解》注云：

以五月首時，寧所未詳。³²

由此可以看出，三傳之注家注義並不相同，旨趣大異。杜預以爲係因「經」之「闕文」故無「傳」可發；顯然注家所理解的《左氏》、《穀

³⁰ 案、《春秋》經文中三《傳》皆以「四時」爲一重要的必須記載，是故或謂「編年」、或謂「時變歷數」，而有「夏四月」、「秋七月」的「無事亦書」之書寫認知與傳統，惟此條經文爲「以五月空書首時」，於《春秋》實中僅此一條，且三《傳》又無傳文，故有正文中所引述杜預與范寧的難以理解之說法。惟何休以「特義」爲解途。則三傳之主要注家間，確實有著「闕」或「不闕」的問題，以及由此而來的「闕疑」還是「特義」的異趣！

³¹ 孫星衍、莊述祖輯校，《春秋釋例》（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80），卷末，〈終篇第四十六〉之〈諸雜稱二百八十有五〉，葉 3a。

³² 校永懷堂本《穀梁傳》，卷 6，頁 40a。

梁》與注家所理解的《公羊》，在此剛好形成了一個對反：前者以為「經闕文」係來自「闕謬」或范寧所謂「寧所未詳」之「闕疑」；而後者則直以為此處之經文有值得發義言說之處，亦即不以此處為「闕謬」與「闕疑」，而以此處為「特書」與「特義」。吾人確實難知如何以此處三《傳》無傳，然《公羊》之何注與《穀梁》范注、《左氏》杜注在其不同之注義的理解之下，「夏五月」在合成文本中顯示的是「注」與「經」的直接遭遇。杜預更是關注到了經文此處的不足為完整經文，認其中有「闕謬」，並置入「經闕文」例中。對於經文的「闕文」之釋，首先是認定此條非完整書寫，然後才能言說其「空白」處為「闕文」---「闕謬」或「闕疑」。如果有一天，我們對於中國古代天文及年代學及其書寫學的認識超過了三《傳》甚或以「春秋歷學」見長的杜預，有無可能「夏五月」就是經文的完整書寫，則此條也就不存在「空白」的「闕文」問題。返以觀之，則杜預之釋《左氏》的不發傳，或是《穀梁》范注的持以審慎之態度曰「未詳」，皆是傾向經文此處有著「空白」的「闕文」疑義。

《春秋》中最為明顯且較無爭議的關於「書寫與否」的「空白」，是十二公中隱、莊、閔、僖四公元年春王正月之下「公即位」的「不書」。此處無爭議處在於以常態而言新公即位之始必須書寫下「公即位」，因此於「此」處未見「公即位」之有形文字，則顯是一「空白」態的出現。有分歧之處則在於此處之「空白」態係：「不書」？「未書」？「闕文」？是孔子有意義的「空白敘述」還是僅僅是一「未書」的「空白」而已？

《春秋》經文「隱公元年」條書云：

隱公。元年。春。王正月。

《左傳》云：

元年。春。周王正月。不書即位，攝也。³³

《公羊傳》云：

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為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穀梁傳》云：

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

傳文所云的「成公志」，「公」指的是「隱公」，而非「惠公」。故范寧注曰「成隱讓桓之志」。³⁴

依杜預《春秋左氏經傳集解》之注說，杜預係以為經文所以「不書公即位」者，係因隱公即位，未舉行大典，故無策書赴告諸侯，故是史官所「未書」，國史本無，而非夫子之筆削。杜預注云：

假攝君政，不脩即位之禮，故史不書於策。《傳》所以見異於常。

³⁵

故依杜注解《左傳》，《左傳》是以為經文本就未書寫，這乃是因為舊史本無之故，所以舊史本無，自然是因為隱公既然「居攝」，未行即位禮，故「不必書」。杜預「以傳解經」的思惟在此條中解釋了《左傳》傳文中的「不書」二字就是「不書寫」的意思，且以為是「史不書於策」；然而，當孔子面對「史所不書」時而又係「異於常」的隱公之「攝」時，「不書公即位」在《春秋》中的本文究竟是否能是「孔子的再書寫」

³³ 杜預，《春秋經傳集解》（相臺岳氏刊本，台北：新興書局），卷1，頁42b。

³⁴ 校永懷堂本《穀梁傳》，卷1，頁5a。

³⁵ 杜預，《春秋經傳集解》（相臺岳氏刊本），卷1，頁42b。

呢？而《公羊傳》與《穀梁傳》則正相反，一曰「成公意也」，一曰「成公志也」，均以孔子在此有「筆削」之動作，以見「不書」之義。並在傳義文字上以「不言」來指涉這一「春王正月」之下的「公即位」之不可有形視見的「空白敘述」。我們知道，兩傳在「書于竹帛」之前，是以「口傳」為其形式，因此「不言」正好與《左傳》的「不書」形成一種對照，這種對照是「口說的 / 文本的」，此一對照正好呼應了它們對「空白敘述」的用詞之不同。從此條來說，顯然《左傳》的「不書」與《公羊》、《穀梁》的「不言」，對於《春秋》中隱公元年的「公即位」之「未見」，有著不同的理解。但是，我們認為，無論這一「空白」是「史所未書」所遺留的，還是係孔子所「不言」的，它們都已是《春秋》中被傳主所意識到了的「空白」，具有非常、特義性的敘述，以是三《傳》各自進行其理解與發傳釋義。

另一部在宋代之後方纔出現的《春秋》之「傳」，是胡安國的《胡氏傳》，胡氏認為，「公即位」在經文中是被孔子「削之」的。胡氏的觀點是：此條經文本在史官書寫時本有「公即位」，但孔子為了表達他自己特殊的「貶隱之義」，所以將「公即位」削去。換言之，胡氏仍然在「空白」態上企圖給予一個有意義的「空白敘述」，胡氏的語言是「削之」。在我們看來，胡氏只是想表達孔子的行動中有著「經文」與先前「史官文本」之間的關係，以及與三傳近似的指涉，除了在內容上他所賦予的解釋是特殊的「貶隱」之外，其「削之」的用詞與三傳的「不書」與「不言」並無不同；看來他仍是受到了三傳的誘導，在方向上仍然被帶入了「空白」場域去思考他的傳釋。

何休在《左氏膏肓》中曾駁斥了《左傳》的說法，而鄭玄又在《申膏肓》中反駁了何氏的非難。可見何休與鄭玄亦在此一「空白」解意上有經學史上的爭鋒與對立，一方言係孔子之筆削，一方則言是史官未書。但關鍵是在於我們所談論的是在孔子的《春秋》文本上所進行的談論，如果要將何、鄭辨論的戰場移至「魯史」與《春秋》的關係，那是另外的一種學術與文化傳承的課題，也將會使何休與鄭玄之間的爭論成為不同棋盤的兩造，而產生「非關經義」的爭鋒；因此，如果兩造的爭辨是有意義的，那麼便是「《春秋》學」內部的三傳引據之爭，

在這一個立足點上，則我們可以說，無論何休與鄭玄的爭辨如何，對於經文隱公此處均有因其「即位」與否而產生的「空白敘述」，則無異辭。異乎者在釋此「空白」為何種「敘述」之義。一曰「攝」，一曰「成隱之志」。無論「攝」與「成隱之志」有何敘述與內容上的差別，「攝」與「成志」均為知此處有「空白」的言辭，且均是一試圖通達孔子賦義書寫的釋義行爲。兩造實均在《春秋》場域之內進行對「空白敘述」的理解。否則便不能稱之爲爭鋒，更不能成立一「何、鄭之爭」的「《春秋》學史」之專門術語。³⁶

《春秋》經文莊公元年：

莊公元年春王正月。

《左傳》云：

元年春，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

「不稱」與「不書」，意同，皆指未見「公即位」之書寫文。《公羊傳》則云：

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弑，子不言即位。君弑，則子何以不言即位？隱之也。孰隱？隱子也。（何注：隱痛，是子之禍，不忍

³⁶ 「何鄭之爭」或亦可稱「鄭何之爭」，原因是我們迄今尚不能全然理解何休對於鄭玄駁其三書的反應與回應，《後漢書》上的記載雖然有著何休「登堂入室」之嘆，但也決不能證明何休這一歎究係在歎什麼？是不予理會？還是不足反駁？抑或不欲與鄭玄競鋒。我們實難推究出一可能而合理之釋。要之，後世對於「鄭何之爭」的成爲一課題，是從鄭玄入手，而「何鄭之爭」之爭則反是。發揚何休之學而企圖代何休反駁，這是清代學者的公羊學重點，以是乃有「三闕」之輯佚；至於認爲《後漢書》何休之歎乃是漢末公羊學已衰之論，則至少應是後世一種歷史觀點，而決不能說是後漢之季的春秋史已被探討清礎，更不能說是何休本身各種經學言說的清晰實貌。參考朱生亦《何休「三闕」之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2004年6月）中對此相關的論述。

言即位。)

《穀梁傳》云：

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繼弑君不言即位之為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

《春秋》經文閔公元年：

閔公元年春王正月。

《左傳》云：

元年春，不書即位，亂故也

《公羊傳》則云：

何以不言即位？繼弑君不言即位。

《穀梁傳》云：

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

《春秋》經文僖公元年：

僖公元年春王正月。

《左傳》云：

元年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

《公羊傳》則云：

何以不言即位，繼弑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
臣、子一例也。

《穀梁傳》云：

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

《穀梁傳》於《春秋》經文「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下則釋云：

繼正即位，正也。

《穀梁》所釋「書」與「不書」之義，正可以參看。又《春秋》經文「宣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穀梁傳》曰：

繼故而言即位，與聞乎故也。

經文於「襄公」、「昭公」下，「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下，《穀梁傳》皆曰：

繼正即位，正也。

至此已可以見，不論是《左》《公》《穀》三傳之「不書」、「不稱」、「不言」者，欲以言說《春秋》中經文之「空白」處也。三傳所釋或有其異辭，然其所以異辭之同者，在於彼等皆係緊扣「公即位」之未見其文而欲爲之釋其何以未見。³⁷三傳得以察知此處有「異」，在於傳主們

³⁷較特別者爲「定公」，經文只書「元年春王」，是此條經文有「不書」者二：「正

月」與「公即位」均未見其文字。杜預直接於經文下注云：

公之始年而不書正月，公即位在六月故。(相臺岳氏本《春秋經傳集解》，卷二十七，頁 373b)

其注蓋以「正月公即位」同一意義層之書寫詞，暗合《公羊傳》傳文所釋。值得注意的是：《左傳》在傳文中卻是書為「元年春王正月」。杜預於此傳文之下並無下注。

《公羊傳》於「正月」則云：

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

「即位後也」一句，已先預示了我們將在後面的定公經文中閱讀到有關定公的「公即位」。故何休於此處即下注云：

雖書即位於六月，實當如莊公有正月。今無正月者，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諱為微辭，使若即位在正月後，故不書正月。

何休的說法很有意思。「實當如莊公有正月」與「使若即位在正月後」，已經明白說出了定公元年不書正月之故，乃是為了「諱辭」，故「移書」於「六月戊辰」之下。是「移書」的「使若」，而非「空白」的「不書」。

《穀梁傳》於「正月」則云：

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

於「公即位」，則云：

不言即位，喪在外也。

《春秋》經文於定公此處未書見「公即位」，較為特別，與上述隱、莊、閔、僖之於首條未書見「公即位」不同，經文於此處並非「不書」之義，而係書見於它處，即書於定公之「元年夏六月戊辰」之下。此在《春秋》中決為一特例，當必有故。故三傳皆有說，《穀梁傳》之傳釋仍以「正」為義，且已釋及「何以書日」義，傳文云：

(經)戊辰，公即位。

(傳)殯然後即位也。定無正，見無以正也。踰年不言即位，是有故公也。

言即位，是無故公也。即位，授受之道也！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

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即位」，謹之也。定之即位，不可

不察也！公即位何以日也？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何爲以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范注：諸侯五日而殯，今以君始死之禮治之，故須殯而後言即位。）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著焉？踰年即位，厲也。（范注：厲，危也。公喪在外，踰年六月乃得即位。危故日之。）於厲中又有義焉。（范注：先君未殯，則後君不得即位。）

案、上引《穀梁》之經、傳、范注所據爲明校永懷堂本。若據清儒鍾文蒸《春秋穀梁經傳補注》所言，則更有討論性，不僅是《穀梁傳》本身的問題，而更已涉及「經文」的文本理解下的版本問題，且亦發可以見出「定公元年」此條的「公即位」確實與隱、莊、閔、僖四公之「公即位」不同。依鍾文蒸《春秋穀梁經傳補注》之經文，所形成的新版本爲：

元年春王三月。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由此看來，鍾文蒸確實理解出了一個新的經文版本，在這個版本中，全然沒有「王正月」的書寫，然而首條猶存有「王」，是故首條之傳文只釋何以「不言正月」即可；換言之，在鍾氏的版本中，定公元年的「正月」，於傳、於鍾氏補注，都是一個經文之「不書」義的面對。其次，鍾氏將經文「三月」自經文「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之上移至首條「王」字之下，使得原本夾在「王」與「三月」之間的傳文，成爲「王三月」的傳文。同時也形成了一個新的「經文」與「傳文」的版本。鍾氏云：

舊本「三月」二字退在下「晉人」上，以「王」字斷句，與桓元年同誤。今改正之，並移下條徐(邈)注於此。《公羊》此年亦以「王」字斷句。孔廣森本改正。（鍾文蒸《春秋穀梁經傳補注》（駢字審、郝淑慧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6.7），卷 23，頁 672。）

鍾氏又釋之曰：

正月所以不即位者，緣喪在外未殯也，明定實不即位，故不言即位，與莊、閔、僖不同，非謂此處有言即位之理也。傳申言此者，因以見即位之文，史所本無，君子更爲去正月以著義。（鍾文蒸《春秋穀梁經傳補注》，卷 23，

根據《春秋》經文其它處之書寫，成立了「義例」的依據，方得以曰此處有空白，空白處有敘述，敘述有義。不論是書或不書「公即位」，或是書或不書「正月」，均係如此。

孔子在《論語》中所曰「吾猶及史之闕文」，歷來注家於「及」字均無注解。「及」字之所以重要者，意謂「文」既「闕」矣，則吾人何以能「知其為闕」，換言之，「史之闕文」何以能「及」？若從三傳之說「空白」為「不書」或「闕文」為義以言之，則什麼是使「空白」能轉為「不書」與「闕文」為義的成立之基？以「闕文」與「不書」釋「空白」有義能成立的可能之基是什麼？孔子賦義「空白」之「書寫」是在什麼狀態下能以「不書」與「闕文」來表意所指？書寫乎？不書寫乎？不可以書見乎？此時，如果我們依三傳所說，「不書」是孔子所賦予在《春秋》中的「空白敘述」，則依三傳所言，在《春秋》中孔子所留下的現存經文中，不止是有形而可以視見的經文，而還更有無形的經文是孔子所留下的「空白敘述」之經文。果爾，我們不禁要一問：「不書」所意謂的未被書寫成有形文字的狀態是什麼？又何以能被傳主們「讀」出呢！我們又何能以一種語言來稱謂並且描述形容孔子給定在《春秋》中的「不書」之意義，說出「它」是什麼，以便讓後世人能掌握、能「及」呢？

「不書」固矣，即便是「闕文」，吾人也必須先「知」此處有「空

頁 672。)

其言「去正月」者，蓋以夫子以刪削而著「不書」之義也。

《公羊傳》云：

(經)戊辰，公即位。

(傳)癸亥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為以戊辰之日然後即位？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子沈子曰；定君乎國，然後即位。即位不日，此何以日？錄乎內也。

是《公》、《穀》皆已於傳文中詳釋經文何以於「戊辰」之日下方書見定公「公即位」之故。顯然與隱、莊、閔、僖四公「公即位」之「不書」、「不言」、「不稱」者不同。

白」態，方能進行一種語言的詮釋活動，言說此處之「空白」態為「闕文」與「不書」之為有意義的書寫與敘述。因此，「空白」之能「及」與能被「知」，「闕文」與「不書」之能成爲一個課題被揭示並被言說出來，必定須是有某種能爲其基且先於其存在而存在者，言說方有可能。也就是說，「闕文」與「不書」之可被言說，是因爲《春秋》本文中有「空白」可言說。

當我人敘述一歷史時，此一歷史總是被構想爲是存在的，然而，「不在」之處呢？「不在」處亦有「史」，一如「史」中必有「空白」或「不在」。然而，你如何言說此一「不在」處的「史」呢？這個提問其實就是《春秋》中的「空白」如何可「及」的問題。《春秋》之爲經的三傳，其所用的方式便是所謂三傳家法的方式，顯然地，無論是《左傳》或杜預之釋「公即位」之「未見」爲「赴告所無」，或是「簡策未書」；還是《公羊》、《穀梁》之以「繼正」或「非常」以釋「公即位」之「未見」；均是依據了《春秋》本文自身所供與的書寫而成立了一種可能的依循，傳家、注家稱之爲「義例」、「書法」。則「公即位」雖「未見」其文與字，卻能在傳注家那裡因「義例」而被其察知，---也就是被傳注家「及」於該處之「空白」，而作出傳解、注解《春秋》該處之「空白敘述」，稱其爲孔子之運筆書寫「賦義」，並於該處章句之下發傳、發注。

至此，成立「空白敘述」的概念，對我們從「不書」入手進行揭示孔子的書寫活動之意義，似乎是有用的，也爲我們自書寫學所進行的「及於史之闕文」與「及於不書」的「及於空白」之可能性的討論，打開了一扇窗口。

四、結論

——空白、敘述與書寫

顧炎武在《日知錄》中〈春秋闕疑之書〉條所欲表達者，乃在於聯繫魯史與《春秋》之間的關係，他認爲凡是魯史之闕文，孔子《春

秋》則「闕疑」之。何以「闕」，「文獻不足徵」故也。這是以「闕文」來釋《春秋》中「空白」狀態的走向。其所云「舊史之所無者」，「未書寫」也；「不名者闕也」，則「待書寫」也；而「不書」之義，則「已書寫」也。這乃是自書寫學的角度而區分出的「空白」之三態。《春秋》所糾纏者，其一則在「孔子的《春秋》」與「史官的魯史」間有多大的關係。依照顧炎武或是顧棟高等清儒的講法，則本來在公羊、穀梁家學者那裏所認知的「不書」、「不言」之義係被彼等轉換成爲「闕文」的認知。由此，我們可以知道，《春秋》中的「空白」狀態是可以被解釋的，三傳後學能在「不書」與「闕文」之間進行「空白」態爲「待書寫」或是「已書寫」的意義認知轉換，就是最好的例子。我們仍然只能在「傳」的層次上進行對「經」的理解與傳釋，但可以確定的是：現存三傳或是四傳的學者，都承認孔子在《春秋》中確有關於「空白」態的「賦義」行動。顧炎武的用詞「舊史之所無者」可以看出他的認知，是傾向於孔子只能在「魯史」的舊迹上「承舊」，然而，「承舊史本無」而保留了「舊史所無」，竟也是一種與「書寫學」有關的「闕疑」或「闕文」，其實便是一種已隸屬於孔子所賦義的「空白」態之「待書寫」。這其實還是漢人的古義。

其次，解《春秋》者的爭議核心：《春秋》中的「空白敘述」之爲何種意義被孔子所賦予了？其實便是「闕文」與「不書」---即「待書寫」與「已書寫」---之間的爭議，在「空白中有舊史」與「空白中爲新經」上移動他們對孔子的「空白敘述」之看法。

在上述我人對「空白」三態的區辨中，重要的是我們已認知到「不書」並不是一種「不書寫」，而根本上竟是一種「書寫」的完成態；因此，爭論究竟是「舊史之闕文」還是「孔子之不書」，仍然只能在《春秋》本文中進行，則「舊史」與「新經」的爭論表面上看來乃是一種今古學的爭議，爭議孔子究竟運「空白」爲筆，在《春秋》中書寫了與否？孔夫子在此，究竟是「書寫」乎？「闕文」乎？而究其實，如果「舊史」與「新經」只能在《春秋》中的本文處來進行認知的論述，則「舊史之闕文」與「新經之不書」便只能是《春秋》中的「闕文」與「不書」。「闕文」是三傳特別是左傳家所持的認知，依照此一認知，

《春秋》中的「闕文」便係孔子依循的「史之闕文」傳統所保留下來的「待書寫」之「空白」，《穀梁傳》傳文的「疑以傳疑」一句尤能傳達出此種認知。而《春秋》中的「不書」，無論是「諱之」、「削之」、「即以爲義」，均是傳達了孔子的以「空白敘述」爲「書寫」的「已書寫」。換言之，《春秋》本文中的「空白」三態告訴我們的，即是除了「未書寫」之外，「闕文」與「不書」均是「孔子的書寫」，也只能是「孔子的」書寫。無論「舊史」與「新經」的關係有多密切，《春秋》只能是三傳的《春秋》，三傳必須遵 / 尊《春秋》爲「經」，三傳方才能稱「傳」。儘管我們也能換一個稱謂詞：「史」，來替換或代換「經」，稱《春秋》爲「史書」，或從「史體論」上視《春秋》爲「編年體書」，均無礙於以上「《春秋》與孔子」的論述。正如劉知幾可以將《左傳》作「史」來看待，近代人也可以將《左傳》作「史料」來看待，但他們用的詞彙仍然是《左「傳」》。《左傳》「章句化」尤其是「集解化」之後，已經無法再溯源出它所已迷失的最初之真正身份，清代劉逢祿影響近代「公、左之爭」甚鉅的《左氏春秋》說，仍然要依附《公羊》與《春秋》才能成立他的「公羊何休學」之「一家言」。

我們在結論中，要再次強調本文自書寫學所進行的區分是重要的，不僅是對「空白」三態的區分，尤其是對「闕文」與「不書」的區分，它暗示了早期有一種書寫行動，在這行動中，有一種「空白」意識之察覺，但卻沒有訴諸於「文字」之有形。但沒有「文字」見諸簡冊之表面，並不代表「不書寫」的立場，相反的，它更是一種特殊的「書寫」的立場。當「空白」被「不書」而「書寫」於《春秋》經文的「上下文」時，一種意圖的「敘述」便可以被嘗試著揭示出來。一旦我們在《春秋》「上下文」間揭示出一種「空白敘述」時，「不書」也就成爲表意的符號指涉，指向「空白的書寫」，也指向「空白的敘述」。因此，「空白」也就與有形符號一樣，也是一種書寫符號，必須加以閱讀及解讀。

本文進行至此，似乎已可作出一個真正的結論：我們已可辨識《春秋》文本中的有意義之「空白」。事實上，**真正的問題似乎總在結論時才真正出場！**一旦我們作出結論式的追問：「空白」既已可辨識，

並且以「闕文」與「不書」自書寫學上將之歸屬於《春秋》中的有意義之「空白」態，且賦予其類型之各有專名：「已書寫」與「待書寫」。那麼，「空白」是否已可排擯在《春秋》上下文之外？對此，我們的想法是：無論是「已書寫」與「待書寫」、「闕文」與「不書」，都已將之指向於《春秋》本文的「敘述」層，麻煩的問題仍在，此問題便是：什麼是「空白」的「無敘述」狀態？「不 / 未書寫」意謂著什麼？筆者意圖嘗試回應之。

1. 從「編年」上來構想此一問題。

以《春秋》本文中的經文而言，並不是「每年每月」均有「書寫」，譬如在魯隱公元年王正月之後，繼接的便是「魯隱公元年三月」，那麼，「魯隱公元年二月」呢？「元年王正月」與「元年三月」有沒有存在一個「之間」的「空白」狀態？我想我們只能說：在「隱公元年王正月」之後，是一個「未書寫」的「元年二月」，但既不是《春秋》中的「不書」，也不是它的「闕文」，而就是不存在的「未書寫」。對於《春秋》而言，它的書寫之序，就是「隱公元年王正月」、「隱公元年三月」，這就是經文的第一條與經文的第二條；並不存在---因為「未書寫」---「隱公元年二月」的書寫世界。至於何以如此，用杜預的理解語言來說，則是因為「常事不書」、或是「大事方書」。³⁸因此，「未書寫」的「隱公元年二月」並不代表「本年無常事」，也不代表「本年無世界中發生的事」，但卻不是《春秋》中的「世界」、不是《春秋》中的「書寫世界」、也不是《春秋》中的「世界中的事」。這個意旨告訴我們，《春秋》之外仍有「史」、《春秋》之外仍有「世界」、《春秋》之外仍有「書寫」，正是因為如此，《春秋》才能成其為「《春秋》之為《春秋》」，才有「《春秋》中的書寫與世界」的成立，而這個成立，正與這部文本被一個文化傳統視之為「經」相符，意謂著《春秋》中的書寫與世界與其它的書寫與世界有其不同，而這種不同，賦予了孔夫子以重要的位置。因之，在「孔夫子的書寫」的《春秋》的「世界之為世界」或是

³⁸ 如《公羊傳》桓公十四年經文「秋八月。乙亥，嘗。」之下，《傳》云：「常事不書，此何以書？」更是反映傳主認為夫子不書常事，書必有義的認知與理解。

「在世界之中」，「魯隱公元年二月」既是「不存在」、也是「未書寫」。

再者，無論是「常事不書」或是「大事方書」，或是公羊家何休所謂的「非常」與「可怪」，³⁹或是穀梁家所謂的「與正之義」⁴⁰，都是牽涉到了書寫者的選擇與意識決斷，書寫者取決之外的「空白」，有無「史」、有無「敘述」、有無「世界 / 事」，顯然便纔是我們問此問題之意義的關鍵。劉知幾在《史通》中所云：「夫名列史冊，自古攸難，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筆削之士，其慎之哉！」這句話所強調的，正是「大事方書」之「大」---書寫的裁決之權正與書寫者 / 筆削之士有關。「慎之哉」的意涵便指向了「書寫」與「不書寫」，後者尤指一種被排擯在「已書寫」與「待書寫」之外的「空白」，我們也可以去追問，「此」處有「史」耶？無「史」耶？不經此一追問，書寫者的裁斷及取決之權的成立，就無其意義。「未書寫」作為一個可以提問的問題，其意義之一，我們的構想與回應如上。

2. 從「書寫意識 / 世界」的邊界來思考此一問題。

從這一個問題的角度上來說，無「史」狀態的「未書寫」，或「未書寫」的「空白」態，根本是書寫者的書寫意識已瀕臨邊界。舉個例子言，《史記》〈五帝本紀〉是司馬遷推遠及於〈黃帝本紀〉的書寫與敘述，在考古學與考古意識未興尚乏的時代，「北京人的頭蓋骨」，根本就是一種書寫能力的邊界，也是意識的邊界。此種「未書寫」是未能也未曾意識到的「未書寫」。「未書寫」的「空白」處就是無「史」狀態。雖然這也是一種「空白」的「未書寫」，但卻不是上述那種經由選擇、裁斷與取決的「不書寫」，而是處在書寫者意識邊界之外的「未書寫」。同樣，以《春秋》經文的「隱公元年二月」之「未書寫」而言，

³⁹ 何休〈春秋公羊傳序〉云：「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校永懷堂本《公羊傳》，何休序。)

⁴⁰ 如「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校永懷堂本《穀梁傳》，卷一，頁 5a)，「春秋之義，諸侯與正而不與賢也。」(校永懷堂本《穀梁傳》，卷一，頁 11b)之類。經文「赤歸于曹郭公」下發傳云：「赤蓋郭公也，何為名也？禮，諸侯無外歸之義，外歸非正也。」(校永懷堂本《穀梁傳》，卷六，頁 42a)

「未書寫」並不代表本年之本月無「史」，不敘述與不書寫的「不在」並不能等同於「無史」。「不在」處也有「史」的意涵是可以被揭示的。因此，「隱公元年二月」的「未書寫」，向我們指示出的是一種「在《春秋》中」的「世界之為世界」的成立。在《春秋》「之外」，「隱公元年二月」或「周平王五十九年二月」甚或是「齊僖公九年二月」都仍然有其「在者」，也有其另外的「世界」被敘述、被書寫；但這並非「在《春秋》中」的「世界之為世界」，也並非「孔夫子的書寫---世界之為世界」之意義。

3.從「書寫」本身來思考此一問題

與「書寫」同時存在的，是「未書寫」。在有形文字書寫「之中」，我們認為，仍然存在著一種「空白」，一旦「書寫」自筆端瀉下，也就一併而存。「未書寫」的「空白」，正是在「書寫」的有形處、上下文、行文「之中」，與之偕存。嚴羽《滄浪詩話》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詩大序〉專家所強調的「詩有興義」，或曰「蘊」，孔子所謂的「詩，可以興、觀、群、怨」，指向的正是在文字之書寫有形處，原本便偕作者書寫而併存在的「未書寫」之「空白」，一但經「閱讀 / 接受 / 讀者」的行動而相觸相接剎那之際，便將「空白」轉成了「蘊」的可以言說、可以閱讀、可以脫離作者的書寫而存在於作者書寫的有形行文之中，我們承認確有一種「未書寫」之「空白」存在，且在作者書寫之際便已產生。這種存在於書寫之初便已存在的未書寫之空白，我們認為，不是作者的書寫所製作的，但卻是於作者書寫時，一種作者未書寫的空白在同時便被製作生產出來，存在於作者的書寫有形之中。只要作者「書寫」，「未書寫」便已同時存在，我們亦稱之為「空白」。

這種「空白」，是使最初文本脫離作者之後仍能存在的重要質素。我們在版本學上稱之為傳本者，其所以能以各種版本的姿態傳世而存在，無非便是因傳本中的有形文字之中，存在著這樣的空白，以為其基，成其能轉換傳本印製成個個版本的樣態。或是漢簡殺青之本、或是唐卷寫本、或是宋元明清的雕版刊本、或是宋刊本的大字、明刊本的小字，作品一旦脫離作者，本身就展開了諸種版本的可能，我們稱之為傳本。傳本之諸版本其所以能將作者所書寫的文字成為諸傳本的

形態與樣式見存於世，字或大或小、行或多或少、十行本的十行樣式、縮本的雙葉合頁樣式，不正是因為字裏行間的不書寫與空白之故！沒有此種不書寫的空白存在，諸傳本焉能成其為不同樣態的諸傳本！而正是因為此一空白的存在，方能使得諸傳本變形---或大或小、或多或少---而出現諸版本，諸版本之間又存在著相對應於作者書寫的互文本的關係，我們可以進行校勘、在比較不同、察其訛誤、考其正字，其學問行動的依據便在於諸傳本的版本學依據。但進一步的追問是：諸版本得以具有相互性且能指向於作者的書寫原始樣態，又何所從來而為其成立與存在的所據？我們認為，其存在便存在於「未書寫」的「空白」之存在。沒有此一「空白」，宋本便不能推其字與字間而成大字本；沒有空白，明本也不能縮其字與字間而成小字本；沒有「空白」，明本更不能插入圖示而成插圖本；沒有「空白」，明代文家所用的五色圈點與評點本也無存在與出現的可能。這還不止是刊刻的問題，我們談的乃是使之能刊刻的形上追問與存在依據。在「書寫」處，「存在」著「未書寫」的「空白」，版本方有可能、脫離作者書寫而傳於世的傳本方有可能。一旦傳本經由閱讀的接觸，傳本方能是「活著」，同時也使被作者書寫的有形文字得與未書寫的空白於相互依存作用而存而在。傳本與閱讀，於是有了找尋作者書寫原意的意圖之可能，也更有了讀者意識解讀之說，或是詮釋其蘊，或是言其言有盡而意無窮。我們認為，一部文本的詩性，亦正是來自於「未書寫」的「空白」。

上述有關「未書寫」的「空白」之論述，指向了一個承載文本信息的傳本現象的揭示，便是：當人死後他的作品可以繼續留在世間，通過不同的版本狀態---傳本而流傳，「興」與「蘊」與「言有盡而意無窮」與「情境」，都在傳本與閱讀 / 讀者的接觸之際，「空白 / 未書寫」存於已 / 待書寫的上下文間被觸動成為「空白」之為「空白」的存在。也由於「空白」的存在，各種傳本才能在脫離作者之後繼續使作者的書寫在諸傳本之版本中，繼續是作者的書寫存在於其中。

各種不同的版本可以有不同的諸版，在邊框與字與字、行與行間轉換著有形處的排版，傳本轉換間的謬誤之可以辨識談論、校讎闕文；宋版的大字與明版的秀氣行書楷體或是清抄本、學海堂刻本的字體，

都是傳本內在的「未書寫」之「空白」結構化了其依舊是一傳本，傳本使得作者死後他的作品仍能在他死後因為他的「未書寫」的「空白」而將傳本賦予了活著的可能。「空白」使傳本中的文字繼續可以通過閱讀而再現其閱讀世界，可能性就在傳本與讀者接觸並在世間出現閱讀之時刻開始。從符號學來說，其間各個版本 / 傳本中存在的共同單位原素，便是與作者在有形書寫之初始便已與之偕存且在其脫離作者書寫之後仍然繼續存在的「未書寫」，也就是「空白」。

馬曰俯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子曰繪事後素鄭曰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素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曰禮

後乎孔子言繪事後素子夏問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包曰予我也孔子言子夏能發明我意可與共言詩疏

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子夏至詩已矣。正義曰此章言成人須禮也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今何謂也者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衛風碩人之篇問莊姜美而不見若之詩也言莊姜既有巧笑美目倩盼之容又能以禮成文絢然素喻禮也

子夏讀詩至此三句不達其旨故問夫子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者孔子舉喻以答子夏也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素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也曰禮後乎者此子夏語子夏聞孔子言繪事後素即解其旨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子夏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者起發也予我也商子夏名孔子言能發明我意者是子夏也始可與共言詩也。注馬曰至逸也。正義曰云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者案今毛詩碩人四

章章七句其二章曰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蛸齒如犀犀嶸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是也云其下一句逸者今毛詩無此一句故曰逸言亡逸也。注鄭曰至成之。正義曰案考工記云畫繪之事雜五色下云畫續之事後素功是知凡繪畫先布素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章也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

不足徵也般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包曰徵成也杞宋二國名夏般之後夏般之禮吾能說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

吾能徵之矣鄭曰獻猶賢也表不以禮成之者以文獻不足故也疏

子曰至徵之矣。正義曰此章言夏商之後不能行先王之禮也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般禮言之宋不足徵也者徵成也杞宋二國言夏般之後也孔子言夏般之禮吾能說之但杞宋之君闕弱不足以成之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者此又言不足徵之意獻賢也孔子言我不以禮成之者以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注包曰至成也。正義曰徵成釋誌文云杞宋二國名夏般之後者樂記云武王克殷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般之後於宋

記云武王克殷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般之後於宋

疏

疏

春秋穀梁傳卷一

晉豫章太守順陽范甯集解

明後學 東吳金蟠較訂

元年春王正月

隱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

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

即位言即位也成志也

取為公也言君意不取

不取為公何也將以讓桓也

也將以惡桓也

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弑之

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

義而不貴惠私惠信道而不信邪

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

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

第天倫也兄先弟後為子受之父為諸侯受之君

親世于親受命於天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

Handwritten notes in red ink at the top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成志', '即位', '取為公', '不取為公', '將以讓桓', '惡桓', '讓則隱善', '義而不貴', '也雖然', '探先君', '第天倫', '親世于親'.

穀梁傳 卷一 隱公

行小惠曰小道也

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昧

及者何內為志焉爾

子之美稱也

言邾子何也

於周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

之有徒衆也

伯弟也何以知其為弟也

目君知其為弟也

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

賤段而甚鄭伯也

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

鄙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

春秋公羊傳卷六

漢諫議大夫司空掾任城何休學

明後學東吳葛森訂

莊公 由何注者未之不言即位是天子例也

元年春王正月

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弑子不言即位君弑

則子何以不言即位不絕也隱之也歟隱隱子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

孫者何孫猶孫也孫也內諱稱謂之孫言于齊

文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齊公夫人也

念母也所以起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

事禮練祭取法存君夫人當首祭事時莊公也夫

人何以不稱姜氏婦人姜氏貶曷為貶

與弑公也其與弑公奈何夫人譏公於齊侯

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侯亦生齊

侯怒與之飲酒飲醉而殺之禮於其出焉使公子

彭生送之於其乘焉上車其轡擗而殺之擗扶上

又作擗亦作拉音同擗音古且反念母者所善

公羊傳卷六

莊公

何休公羊傳卷六

三七

也則曷為於其念母焉貶其重不與念母也

則志不與念母也又欲以王法所誅至此乃取者

法之亦不可加誅誅不加之

夏單伯使王姬

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禮諸侯也

通賢共治示不獨重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為政所以

舉二人小何以不稱使如者內稱之文天子

召而使之也使之者何使我主之也使之文方使

使我主之非一諸侯天子嫁女乎諸侯必使諸侯同

姓者主之諸侯與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

同姓者主之大夫與諸侯同姓者不自為主者尊

義有君臣之禮則與所適者之禮同姓者有血

脈之屬宜為父道與所適者之禮同姓者有血

與之者中則備陰和之適天子嫁女於諸侯備姪

婦如諸侯之禮義不可以天子之尊絕人繼嗣之

禮我主者者惡天子也禮義不接并屬人繼嗣之

各下七音反音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外知言

12. 經所據為例考不同

信之王 明說去 前秋

白志 言 解 言 日

Main text area with vertical columns of commentary and annotations in red and black ink.

已錄之矣故出乃地

冬十月乙未子般卒

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言子赤卒君存

稱世子明書世父君薨稱子某錄日無君故稱子

尚存猶以君前臣名也既葬稱子也錄其始之義

一年不二君踰年稱公不可謂子般卒何以不書

葬定卒如俱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則立廟則

書葬也子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也君下無君

卒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也君下無君也君

卒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也君下無君也君

公子慶父如齊

如齊者奔也是時季子新既牙慶父難歸歸鄧恩

樂猶不自信於季子故出也不言奔者起季子不

狄伐邢

探其情不暴其罪也

元年春王正月

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不言即位復發傳者

年若義異故也孰繼繼子般繼子般也孰弒子般

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弒君何

以不誅將而不免過惡也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

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論季子當從親

為歸獄僕人鄧扈樂惡乎歸獄歸獄僕人鄧扈樂曷

之時樂會淫于宮中子般執而鞭之莊公死慶父

謂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盍弒之矣使弒子

般然後誅鄧扈樂而歸獄焉

子至而不變也

齊人救邢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洛姑

季子來歸

其稱季子何

其言來歸何

齊仲孫來

齊仲孫者何

公子慶父也

公子慶父則曷為謂

齊仲孫者何

公子慶父也

公子慶父則曷為謂

齊仲孫者何

春秋公羊傳卷十

漢諫議大夫司空掾任城何休學

明後學 東吳葛蕪訂

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

公何以不言即位言即位公繼弒君子不言即位

此非子也其稱子何公繼子般傳不言子臣子

一例也諸父兄弟以臣之繼君猶子之繼父也其

服皆斬衰故傳稱臣子一節○衰七曹反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森北救邢

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齊不救不及事也不

及事者何邢已亡矣亡則其救之止次以起之執亡

之蓋狄滅之狄伐邢為不言狄滅之據狄滅為

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據徐人取舒晉滅夏上

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

能救則桓公恥之故以自諱所以厚責之曷為先

言次而後言救謂救後言君也通君命故先言救

知實諸侯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故

而文已曷為不與據桓公諱之實與不書所封而

文不與文曷為不與據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

此道大平制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

何止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

能救之則救之可也主書諸侯文備實也

夏六月邢遷于陳儀

陳儀左氏作夷儀

遷者何其意也其意自欲遷時邢創遷之者何

非其意也謂宋人遷宿也書者識之也王者封諸

在魯不在險其後為所滅是也遷則大國月重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此一事也曷為復言齊師宋師曹師謂首後凡

不復言師則無以知其為一事也言諸師則據實與

城之未必反故入也故順上歸文則知桓公宿留城

事之為一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夷者何齊地也齊地則其言齊人以歸何謂從

歸不書齊地也謂似隸反子不夫人薨于夷則齊人

以歸者齊人所以歸于夷夫人薨于夷則齊人曷為

以歸至夷也齊人曷為故以歸至于夷桓公召而

殺殺之先言歸後言以歸而不言安者內據公召

春秋公羊傳卷二十五

漢諫議大夫司空掾任城何休學

明後學東吳金蟠訂

定公

元年春王

定何以無正月即據莊公葬正月書正月者正即位也諸侯之即位正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位即

月實書如莊公有正月今無正月者昭公出奔國當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諱為微辭使若即位

在正月後故即位何以後正即位昭公在外昭公不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為未可知元據已解在外

季氏也即位不迎而事之則不得即位定哀多微辭微辭即下傳所謂言是也定公有王無正月言多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人謂定公言主人者

能辭非獨定公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此假說主人謂定哀也假使定哀習其經而讀時君上以

諱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慎之毛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或○數本

仲幾之罪何伯言於京師成不莢城也若今城

是也禮諸侯為天子治城各有分寸尺仲幾不

治所主○義素戈反一或作義一或音初危反衣

公羊傳卷二十五 定公

反其言于京師何謂言成伯討也大夫不無

稱名氏見伯討之得伯討以京師伯討則其稱人何

于城解名氏諸侯伯執不稱人復復此難者第

據未解嫌大夫無人相執與諸侯同同此難者第

反解音解以非伯討故不曷為貶據晉侯伯執

不與大夫專執也曷為不與謂伯實與是于京而

文不與文不與者貶文曷為不與大夫之義不得

專執也大夫不得專相執時諸侯也不言歸大夫

不在常書又月者善為天子執之○別彼列反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去之晉莫不見容死於乾侯

戊辰公即位

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為以戊辰之日然

後即位入已可知得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

始其喪故示盡於堂昭公死於外不得以君臣禮

中而葬於階下西階之上於處葬於兩楹之間大

之思動以遠也禮天子五日小斂七日大斂諸侯

三日小斂五日大斂大夫二日小斂三日大斂

夷而經殯而成服故戊辰然後即位凡喪人三日

飯扶柩反舍戶音音容本又作屬子沈子曰定君

乎國禮昭公之然後即位不日此何以日據

不日錄乎內也內事詳錄善得五日即位故日主書

一七五

15.23 The Master said, "The superior man does not promote a man *simply* on account of his words, nor does he put aside *good* words, because of the man."

15.24 Zigong asked, saying, "Is there one word which may serve as a rule of practice for all one's life?" The Master said, "Is not **RECIPROCITY** such a word? What you do not want done to yourself, do not do to others."

15.25 The Master said, "In my dealings with men, whose evil do I blame, whose goodness do I praise, beyond what is proper? If I do sometimes exceed in praise, there must be ground for it in my examination of the *individual*. This people supplied the ground why the three dynasties pursued the path of straightforwardness."

✓ 15.26 The Master said, "Even in my *early* days, a historiographer would leave a blank in his text, and he who had a horse would lend him to another to ride. Now, alas! there are no such things."

15.27 The Master said, "Specious words confound virtue. Want of forbearance in small matters confounds great plans."

15.28 The Master said, "When the multitude hate a man, it is necessary to examine into the case. When the multitude like a man, it is necessary to examine into the case."

15.29 The Master said, "A man can enlarge the principles which he follows; those principles do not enlarge the man."

15.30 The Master said, "To have faults and not to reform them, —this, indeed, should be pronounced having faults."

15.31 The Master said, "I have been the whole day without eating, and the whole night without sleeping:— occupied with thinking. It was of no

Confucius' Writing

“Gap” between the “Omitted” and the “Unwritten” in *Spring and Autumn*

Lee Chi-hsiang

Abstract

In this text, I hope I have indicated my research direction to look more deeply into *Spring and Autumn*, making use of narratology to help understand this historical narrative. I also intend to find a more appropriate approach to its meaning as phrased by Confucius writing, also relating this approach to the traditional commentaries.

Above, I have put forth some concepts as key points for this proposal: the “omitted”, the “unwritten”, “gap”, “gap-narration”. All of these concepts are, I think, concerned with narrative and writing, indicating that they belong to narrative theory, or narratology. But the important is beyond using these terms, providing a new approach to *Spring and Autumn*. It is not an easy task to propose a well-grounded view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models of thinking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But a new view can embody the spirit of our time, developing from the base of traditional interpretations.

In my consideration, how to reinterpret “shi” (史) and the Confucian idea of meaning are the main aims. If we want the Classics to encounter contemporary spirit and scholarship, I think the best way is with our own reasoning to use contemporary theories to represent traditional concepts in order to reach a new understanding of our

tradition.

Keywords:

Spring and Autumn three-Commentaries Writing
Omitted Unwritten Gap Blank of Narrative